

“布鞋男团”用脚步丈量中华世遗

钱文忠

多年前，单霁翔先生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初，曾穿着一双老布鞋，用5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故宫的1200座建筑和9371间房屋。据说，光布鞋就磨坏了20多双。

退休后，单霁翔先生从“故宫看门人”变成“世遗推广人”。继续穿着布鞋踏上文化探访之路的他，不仅组建了一支“布鞋男团”，还通过电视节目的形式向大众呈现他们一路体验、一路求索、一路交流、一路感悟的过程。这就是今年春天在浙江卫视热播的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作为全国首档聚焦世遗文化且集揭秘、互动、纪实于一体的节目，《万里走单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随着2019年“良渚遗址”的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5处，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全球前列。那么相应地，在保护它们的同时做好活化、利用的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且迫切，因为只有使灿烂的遗产真正走进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才能真正“活起来”。

如《万里走单骑》这般用心、用情、用功的优秀文化节目太需要。在我看来，它特别注重强调的是“走”的精神。我是研究古印度梵文巴利文的，十几年前在《百家讲坛》专门讲了《玄奘西游》。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就是一个坚定勇敢虔诚行走的人，他用自己的双脚西行五万里，去他心目中的佛教圣地求法，再用他的一双脚，将在印度学得的他认为的高妙知识，带回长安。

我想，正是因为有很多像玄奘大师这样



《万里走单骑》中的单霁翔。

用双脚和心灵去行走的人，才造就了大唐的文化盛世。李白24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足迹踏遍山川湖海；杜甫一生“壮游”，在颠沛流离中阅尽世事……千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是如何感受大唐盛气象的？就是从他们的诗文里，从他们在行走中感受到并且流传开来的抒怀里。

“走”的精神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只有在脚踏实地的行走中，我们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这一路上，《万里走单骑》先后探访了良渚遗址、厦门鼓浪屿国际社区、福建土楼、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杭州西湖、都江堰

-青城山、苏州园林、黄石矿冶工业遗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十堰武当山、皖南古村落等分布在中国各个区域的文化遗产地，涵盖了考古、社区、民居、工业、农业、水利、自然、人文等丰富多样的遗产类型，完成了一次面向大众的世遗文化知识普及。

“布鞋男团”每到一处世界遗产地，日均步行超过3万步。节目用脚步丈量世界遗产，并在专家学者、当地居民的共同解读下解密每一块“文明的拼图”，越行走就越有求知欲，越发现就越有自豪感。因为这样的行走，其实是一场和我们民族的历史、艺术、思想、智慧以及梦想对话的过程。

程。或许自此之后，你再见到杭州西湖或苏州园林，便可以通过一片水、一扇窗、一棵树，和古人发生心灵的共鸣；你再见到都江堰或武当山，便可以想象千百年前的能工巧匠们火热劳动的样子，触摸一代帝王、一任官员的雄心壮志。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认为，称得上“传统”的东西一定是当时最“时尚”的东西。所以，当传统当中的精华凝聚成为文化遗产以后，特别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以后，它们身上一定具备了“时尚”的DNA。《万里走单骑》用年轻人喜欢的真人秀形态走近世遗文化，用鲜活的方式讲述中华文化之美、感悟深厚底蕴，并在每一期都通过“守望行动”，完成一次非常有仪式感的文化致敬，这样的表达方式无疑是极具亲和力、感染力和共情力的，能够唤醒我们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最深层所包含的“时尚”基因，让年轻人为它而着迷、激动和自豪。保护和利用的终极目的就是传承，而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传承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时尚DNA”。

很多年前有人问我，你觉得《百家讲坛》对于传播传统文化的意义是什么？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这些主讲人基本就是“药引子”，药引子单独吃没什么用，但是吃中药如果没有药引子，可能药力就沒那么大，药效也没那么快。今天，文化节目逐步从室内走向户外，元素更丰富，互动更立体，“药引子”的作用也在升级。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会在《万里走单骑》的启发下踏上自己的“万里走单骑”，走出一片精神世界的天宽地阔。

草地 书话

邹近

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有着不断裂文明史的民族。文明不断裂的原因何在？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新著《不断裂的文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是对此一世界之问做出的中国之答。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或者更早。中国的文化是没有断流传承下来的。该书从文物考古角度解读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延续脉络。作者以“中和”理念为线索，从明清讲起，回溯到遥远的王国时代，通过对都城、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等的解说分析，明确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中的国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不同时期、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王朝，对中华民族秉承一以贯之的国家认同。

用一本400多页的书，把整个中国上下五千年的都城、陵墓、礼制建筑、文字等都讲清楚，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该书的出版，从这一意义上讲，是一次有价值的突破。

该书所讲解的几大物化载体，若要完全展示，从操作性来说是不可能的，而这就需要作者的剪裁与逻辑组织。这本著作最具创造性的地方即在于用“中和”理念为线索贯穿全书，使得五大章节有“总论——物化载体分论——结论”这一清晰的结构。出土文物、遗迹正是这场“薪火相传”的直接见证者、述说者。它们是中国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清晰记录着伟大文明绵延不断的生命力。

刘庆柱先生做了几十年的考古研究，该书的成形是基于他学术生涯的思想结晶。其内容重点为什么放在都城和陵墓？他解释道，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二元社会文化——“阳间社会文化”和“阴间社会文化”。阳间社会文化的代表主要是都城——国家的政治舞台；阴间社会文化即陵墓城的缩影。此外，书中还爬梳了礼器和礼制建筑文字。自古华夏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建筑是古代城市建设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很多城镇都还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而汉字的几千年延续性更是举世瞩目。

作者并非止步于对文物、遗址的表面介绍，该书最大的亮点就是深入这些考古物证之下，挖掘出在物质表象背后历史的、文化的庞大身影。作者细致分析了这些不同时空的考古遗址的共同特点，指出其蕴含着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最后必然归结于国家认同——中国何以谓之“中国”。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传承脉络是独一无二的。从今天这个时间点，一路回溯而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史是由多民族跨越“历朝历代”薪火相传而来的，他们秉持着贯穿始终的国家认同理念，在开放中融合，在创造中发展，在开拓中传承。这是我们今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重要基础和文化源泉。

刘庆柱先生在序言中就表明了写作本书的初衷：“这应该是一本学术性、理论性‘很强’的图书，但是我想把它写成一本大家都能够读懂的介绍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考古书籍，因此在撰写中，我首先考虑的是，要用大家都能够读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去写，因为我想本书就是写给社会大众的。”

刘先生坚持认为，学术不能只是“阳春白雪”，思想若没有更多人去学习、去理解，其价值就大打折扣。学术需要深入到大众阅读的层次。那么叙述的语言就必须深入浅出，该书语言风格简练，中间还穿插了不少故事，以增强趣味性。

为了吸引读者，作者还创造了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结构——采用由近及远、由已知到未知的叙述顺序，打破了此前考古历史著作从远古讲起的书写惯例，让读者从身边事物、已知事物出发，去一步步体悟文化的沉淀，追溯华夏文明之根。

我们通常认为考古书籍“曲高和寡”，很大的原因就是成书形式的“不接地气”。本书的定位是兼具学术与通俗，所以编辑增加了数百张的遗址实景图、遗址复原图、文物照片、古代书画作品等，不仅丰富了该书内容、形式，还能印证文字记载，比如“北宋东京城”一节，插入宋徽宗《瑞鹤图》——那群鹤飞舞的地方不正是北宋东京皇城正门宣德门吗？

各类图片的编排也很有考究，例如讲到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遗址就前后排列了其遗址实景图、平面示意图、建筑复原图，从逻辑上讲，正是由遗址绘制出了平面图，在二者基础上，再绘制出复原图。从今日回首往昔之辉煌壮丽，可遥想两千多年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惊险场面。又比如“清孝陵”一节中，在其平面示意图旁，按照进入陵园的顺序，插入碑亭、神道、隆恩殿的实景照片，这样的编排，使得读者跟随作者的叙述即可进行一场游览。

本书用文物和遗迹等看得见的素材，展示五千年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这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都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这样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底气，是我们国家高歌前行的力量。

虫文·虫鸣·虫心

草地 百家谭



朱瀛椿书中内容。



书桌木头上的虫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刘亮程

朱瀛椿的书衣坊坐落在南师大校园的树林中，细竹竿围起的小院，与外面隔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围栏上看不见门，朱瀛椿从里面拉开一小片围栏，我们进去后，门又回到围栏上，成为它的一部分。

小院里放着些木制旧物件，湿漉漉的，像是刚下过雨。靠围栏种植了爬藤植物，我的新书责编译林出版社副社长志宙说这是朱老师给虫子种的。来之前志宙介绍说，给我的书做设计的朱老师，是一位跟虫子打交道的人，你们可以聊聊虫子。

书衣坊是由一个旧厂房改造的，原有空间中加了两层，楼梯陡而窄，每个空间里都是朱瀛椿的虫子作品。在他设计的一本书封面上，活灵活现爬着一只黑蚂蚁，我明知道是印上去的，却还是忍不住拿手指想按住它。在屋里能听见外面树林草丛的虫鸣，有几声或是他种的那几棵爬藤上的虫子发出的。还有几声，像是被他制作成夸张雕塑的虫子发出的。

朱瀛椿出版过一本很好玩的书叫《虫子旁》，是给我们这些“人字旁”看的。虫子旁的字爬在字典中，爬在诗和散文小说中，爬在某些人的名字中。某些人，或许是虫子转世，来教我们和虫子认识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朱瀛椿发现的虫文。虫子在树皮下、在树叶上啃咬爬行的痕迹，被他收集起来，做成唯有虫子能看懂的虫文书。或许虫子也不能看懂。它太短暂的一生来不及回头看。但这个叫朱瀛椿的人有充足的时间看虫子走过的痕迹，并把它做成文字。我看那些虫文，虽然不认识，但一点不陌生，它们出现在我从小到大见过的草叶和树皮上，还有泥土地面上。无处不在的虫子，一直在我身

边写字，用它们的嘴、爪子和整个身体。一个笔画不多的虫文，或许就是一只虫子的一生，有的虫子从早晨活到中午，一辈子就过完了。有的会活几天、几个月。它们在那么短促的生命中，一声紧接一声地鸣叫，像是有多么紧要的事情。

我建议朱先生把他收集整理的虫文解读出来，每个字标出不同的虫鸣声来，做一本《虫人词典》，便于我们和虫子交流。在自然界中，都是虫叫虫应。人若知道了虫在叫什么，能与虫呼应，该是一件多美妙的事情。

不过，若真安置一堆设备去录制虫鸣，变成科学的研究，又没意思了。我们和虫子之间，有一条古老直接的心灵通道，虫鸣入耳时人已然听懂，心有感应；人心中亦有万千虫子鸣叫呼应。我早年曾写过水草丰茂的年成里“一尺厚的虫声”，也写过干旱少雨季节“虫声薄得像一页纸”。南京水系密布，植被丰茂，是虫子繁殖生息的好地方。夜晚我在宾馆高层，竟听见了从街市升起的阵阵虫鸣声，这座古都被四野的虫鸣包裹，人声有30层楼高，虫鸣便有70层楼高，被虫鸣托举的人的梦，则高入云天。

书衣坊的最上一层只有屋脊处高出人头，斜屋顶缓缓低下来，做成书架的山墙有半人高，过去拿书要弓腰低头。这个低矮的环境却并不压抑，有回到童年某个小小房屋的孤独感觉。屋脊是旧的人字梁木结构，或是哪个旧建筑上拆来的，有年月了，木头上有虫洞，抑或有虫子生活其中。这个琢磨虫子的人在木梁下走动时，木头中的虫子一定能感觉到。人缓慢下来时，身体的动作会变成像虫子一样的蠕动。

朱瀛椿打开隐藏在书柜上的暗门，带我们进到一个小房间，四壁都是书，抬手可触到斜面屋顶。他又推开一扇暗门，躬身进到一个

子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在想着做着虫子的事情。千千万万的虫子在地上爬，总有一些虫子爬到我心里，被养起来。

“我在三十年前虫子爬过的路上，听见你走来的消息。”

这是我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写作的新小说《本巴》中的句子。

我们在有虫洞的木梁下谈论虫子。我建议朱先生在我的《本巴》和《一个人的村庄》书名设计中用虫文书体设计，想必这样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一个人的村庄”也是一只虫的村庄，或是一条狗、一只鸡、两窝蚂蚁的村庄。不知道他最终是否采纳了我的建议。他只是对我报以诡异一笑。他笑起来时面部表情像是虫子的。这个痴迷于虫子的人，是否会越来越像虫子呢？

三年前，我在南京师大附中讲过一堂大课，讲到我们书院的虫子。每年暑假都有孩子来书院学习，书院虫子多，都不咬人。我教孩子们接受这些小虫子，喜欢听虫鸣，就得接受虫子在身边爬，偶尔爬过你的手臂，它只是在过路，让它过去便可。我们和虫子都在往秋天走，是声音相伴的同路，我们并不比虫子走得更远。

那课堂，我把遥远地方的风声和虫鸣带给了孩子们。在后来的对话部分中，一位学生说他读了我的所有作品，并提了很有见地的问题。我被一个中学生知己感动。我和学生的对话部分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语文学习》上。

我在长篇小说《捎话》中，写了一位通晓数十种语言的翻译家，最终听懂了驴叫。但他无法把驴叫翻译成人的语言说出来。他只能在最后时刻发出“昂叽昂叽”的驴叫声。

朱瀛椿会不会听懂虫子的叫声呢。他把那些虫子的生命轨迹，当一种符号去研究时，他和虫子便建立起一种个人联系。江南水乡的无尽虫声，给了他一颗难得的“虫心”。这颗心或许会被虫子感知。或许虫

我把木干上的虫文拍发给朱瀛椿看，他说精致极了。

我说，虫迹看久了都像是神迹。